

德国侵略 山东史

王守中著

人民出版社

德国侵略山东史

王 兮 中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钱月华
版式设计：刘宝华

德国侵略山东史

DEGUO QINLÜE SHANDONGSHI

王 守 中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印张 237,000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ISBN 7-01-000034-4/K·21

(书号11001·880) 定价 2.10元

DA 11 10

目 录

第一章 1897年以前的中德关系	1
一 1860年以前德国的对华贸易	1
二 1861年中德《通商条约》的签订	4
三 1861——1896年德国在华势力的增长	15
第二章 德国势力进入山东	36
一 李希霍芬的中国旅行及对山东的调查	36
二 德国天主教圣言会在山东	42
第三章 德国侵占胶州湾	67
一 胶州湾的形势与清政府的设防筹议	67
二 德、俄勾结侵占胶州湾的阴谋活动	72
三 巨野教案与德国强占胶州湾	86
四 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与列强的分赃协议	96
五 中德谈判与《胶澳租界条约》的签订	111
第四章 山东人民反对德国侵略的斗争	123
一 日照教案及德军入侵内地的暴行	123
二 毓贤 大刀会 义和团	139
三 高密人民反对修筑胶济铁路的斗争	152
第五章 德国在青岛的殖民统治与经营	161
一 殖民机构的建立及对人民的统治	161
二 德国在青岛的殖民地经营	174
第六章 德国经营下的胶济铁路和山东煤矿	210

一	胶济铁路的修建和经营	210
二	德华矿务公司经营下的山东煤矿	223
三	德国开挖金岭镇铁矿和设立炼铁厂的计划	236
第七章	山东绅民的收回利权运动	241
一	德国在山东扩大掠夺利权和对民办事业的压迫	241
二	山东绅民收回路矿利权的斗争	252
三	商办烟潍铁路的发起与夭折	266
四	山东收回利权运动的特点	270
第八章	结尾	273
一	德国在山东政策的变化及中国限制德国特权的努力	273
二	德国的对华政策及与其他列强的矛盾和斗争	278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在华势力	293
四	德国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垮台	300
附录	引用书刊目录	308
后记		313

第一章

1897年以前的中德关系

一 1860年以前德国的对华贸易

中国和德国虽然远隔重洋，但两民族之间很早就有了接触关系。13世纪时，蒙古汗窝阔台于1235年命拔都远征欧洲，侵入捏米斯（即德意志），德意志各邦联合起来对蒙古军队的侵略进行了抵抗^①，这是中、德两民族接触的开始。后来随着西欧一些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到16—17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又逐渐扩张到了东方，开始了对中国的殖民渗透。不过，在西欧来说，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较晚，德国与中国的贸易，是从18世纪才开始的。18世纪中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批准设立了一家对华亚洲贸易公司，在1752—1757年间，这家公司的船只曾到达中国的广州停泊过十数次。德国人报告说，当“普鲁士国王”号船第一次到达广州时，“中国人很早就听说过许多有关普鲁士人的事情，他们很高兴认识这个国家，并立刻给予它以一切自由行动之权，象其他各国在那里享受的一样。（中国）河泊所的主管官员未曾接受礼物”。这只船在广州所买的货物，主要是茶叶、生丝、丝织品和瓷器。货物清单列有“瓷釉汤盘1014件，描金瓷釉餐盘2910件……朱古

^① 《元史》，第121卷，列传8，《速不台》，中华书局1976年版。

律杯碟 1422 件”等等。后来，普鲁士的船只有的也参与了非法向中国贩卖鸦片的贸易。随着德国商人的日益增多，到 1887 年，德国人便在广州设立了第一任普鲁士王国领事^①。

当时普鲁士还是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商业势力並不发达；而且西方对中国的海上贸易，主要为英国人所垄断，普鲁士没有与英国抗争的能力，因而它的海上贸易受到极大的限制。

与海上贸易同时进行的，还有一条陆路贸易渠道，那就是德国商人把普鲁士和萨克森的布匹，经过俄国而不纳税地运往中国的北部出售。在 18 世纪 70 年代中，每年已有 3 万匹左右的布匹运往中国。1817 年以后的几年中，每年从陆路运销中国的布匹达到了 4—5 万卢布^②。俄国为了保护它的织布商的利益，于 1820 年实行征收外国货物通过税，迫使德国人放弃了陆路贸易。此后，德国商船虽然又从海上贩运布匹到广州，但数量有限。

德国对中国的贸易有较大的增长，那是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

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封建古老的大门被英国用重炮轰开了，西方各国的资产阶级都欢欣鼓舞，德国的工厂主和商人也不例外。他们认为，一个拥有 3.5 亿人口的中国市场，“对于世界贸易是一个巨大的、也许比北美洲的发现更大的收获”。德国的资产阶级要求普鲁士政府派外交官到中国，抓住这个机会扩大对中国的航运和贸易。据统计，1844 年德国输入中国的货物总值是 27800 多英镑，1845 年增加到了 117759 英镑^③，1860 年更

① 施丢克尔著，乔松译：《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37—39 页。

② 《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 39—40 页。

③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 册，第 41—43 页所载统计表。

增加到了1400万两^①。虽然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贸易，由于受到中国自给自足经济的顽强抵抗，发展并不稳定，但德国与中国的贸易，从上述数字看，发展还是相当快的。

随着德国对华贸易的发展，德国在中国沿海的航运势力也日益发展起来。鸦片战争以后，德国的帆船队追随着英国的船队源源不断地开往中国，它们除了装运少量的德国货品之外，大部分是装运英国所指定的货物。1860年德国商船驶入香港者达到了138艘^②。这些德国商船开到中国后，大部分留在中国沿海从事运输业。据德国人估计，中国沿海的航运业大部分操在德国人手里，从而使美国和英国的竞争者大为恼火^③。当时外国人在中国沿海从事运输业，获纯利一般达投资的50%，使中国的民间航运事业遭受了极大破坏。

与此同时，有不少德国人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定居下来开设商行，而且一部分已经发了财。1849年，在中国开设商行的德国人有33名，50年代又有了显著增加，到了60年代，中国沿海的每个通商口岸，差不多都有德国人开设的洋行了。他们主要从事中国茶叶、丝和其他土产品的出口，以及鸦片、英美棉织品和一些德国产品的输入业务。后来长期为克虏伯推销军火的著名的礼和洋行，就是1843年来广州的。

但是总的说来，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德国与中国贸易的数额是有限的。以1844年和1845年为例，德国对中国出口贸易的总值，分别为27868镑和117759镑，这和同期英国对中国的出口总值分别为8417625镑和9351445镑相比，约仅占英国贸易总值的1/302和1/80^④。这种情况的存在，是和德国内部的政治经济状

①② 曾友豪著：《中国外交史》，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5年版，第108页。

③ 《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51页。

④ 据《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册，第622—623页所载统计表摘录计算。

况密切相关的。因为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直到19世纪初叶，德意志还是一个农业国，3/4的居民住在农村^①，在经济上还远远落后于英、法等国，这就决定了德国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对外贸易。到了19世纪40—50年代，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了迅速的发展，但它在政治上仍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资产阶级还没有取得革命的成功，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因而德国的商人不得不长期依靠别国的领事来保护，特别是屈从于英国的限制和支配。所以，1860年以前，中、德间的贸易始终是有限的。

二 1861年中德《通商条约》的签订

普鲁士远征队的组成

19世纪40—50年代，德国的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下面所列的比例数字，可表示其发展的情况。

德国工业生产在世界上最发达的
国家中所占的份额^②

年 代	德 国	英 国	法 国	美 国
1840年	12%	45%	不详	11%
1850年	15%	39%	不详	15%
1860年	16%	36%	12%	17%

这个表的数字说明，这一时期德国的工业生产，至少已赶上

① 维纳·洛赫著，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近代现代史教研室译：《德国史》，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38页。

② 维纳·洛赫著：《德国史》，第203页。

了法国，而和美国大致相等了。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促使其资产阶级掠夺海外殖民地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当时被英国轰开了大门的中国市场，对德国资产阶级有极大的吸引力。而且随着德国航运业和商业竞争力量的加强，德国商人们感到，他们的利益单靠别国的保护是靠不住的。因此，德国国内外的厂主和商人，不断要求其政府与中国缔结通商航行条约，以保证他们在中国的特权地位。代表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普鲁士政府，也希望通过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从而使它参加在东亚享有特权国家的行列，以提高它的国际国内威望，巩固和加强它在德国的统治地位。英、法侵略者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天津条约》的签订，更进一步刺激了德国向中国扩张的欲望。1859年9月29日，普鲁士商务大臣海特在致国务总理曼陶斐尔的一封信里说：中国刚被胁迫签订条约，“普鲁士也应从那里发生的事变中尽速设法捞点好处，而不要等待别国的商人阶级占领了市场”^①。正是出于这种愿望，普鲁士政府于1859年秋天，决定派遣一个远征队到东亚，与中国、日本、暹罗建立外交关系并缔结商约。

为了胁迫清政府顺利地同德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德国组织了一个庞大的远征队，其中包括一个外交使团和3艘军舰。前任华沙总领事艾林波被委任为外交使团的团长，其成员有外交使节、海军军官、商人和科学家等。那个在后来德国侵略山东中起了决定作用的地质学家斐迪南·李希霍芬，就是其中的成员之一。远征队其余的一些成员，后来成了德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和海陆军的高级将领。可见，德国组织的这个远征队的班子是相当强大的。

在德国的远征队出发之前，普鲁士政府曾经训令艾林波，要

^① 引自《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56页。

他在中国为德国取得与英、法、美、俄四国同等的权利与地位。如果中国拒绝谈判，“可采用敌意的示威行动”，倘有必要，“他可以积极地在那里作战的国家”联合起来。这就是说，普鲁士准备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但因没有找到适当的借口和德国军舰不能驶进天津的白河而作罢^①。可见，德国在试图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一开始，就把中国作为剥削、奴役的对象，并不惜采取敌意的压迫手段。

1860年初，远征队离开德国东来。因为这时英、法、美、俄等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尚未正式批准，艾林波感到他与中国订约的时机还不成熟，故先率远征队去日本，在与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后，于1861年3月7日到达上海，不久又到达天津，开始了与清政府谈判订约的活动。

清政府对德国要求订约的态度

德国派遣远征队到中国要求订约时，中国正发生着两件大事：一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正在进行；二是英、法侵略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各国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两件大事把清政府的王公大臣们弄得焦头烂额，不得安宁。1858年他们被迫与英、法、美、俄签订《天津条约》后，其他各国也纷纷趁火打劫，要求与清政府订立条约，允许公使驻京，这使当时主持外交事务的奕訢，“感到极为可厌”，都被他予以“严词驳斥，并将其照会原封掷还”了。1861年1月24日，奕訢又上奏咸丰皇帝，要求发布谕旨，饬下五口通商大臣兼江苏巡抚薛焕，对其他要求立约的各国设法阻止；一面又照会英、法、美三国公使，“以各小国如一体换约，则与三国并驾齐驱，转自齐于小弱之邦”，

^① 《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60—61页。

要求英、法、美三国“力为劝阻”^①。显然，这时清政府是不愿意把被迫给与英、法、美、俄各国的特权，也一律用条约的形式给与其他各“小国”的。德国来要求订约，开始清政府也是把它作为小国对待，也想加以拒绝的。比如，在普鲁士远征队到达中国一年以前，德国就照会美国政府，要求美国指示它驻中国的使节，帮助德国与中国订立条约。1860年2月，美国驻上海领事遵照美国政府的指示，照会苏松太道吴煦说：普鲁士国“现派于伦白（即艾林波），带领总兵官孙特华，管驾兵船三只，前赴大清、暹罗、日本等国，立约通商”。当时江苏巡抚何桂清，“批令照复美国领事，令即寄信阻止”。并告以“该国向来即在上海贸易，其完纳税钞等项，本照各国办理，准其循旧，未便另立条约”，由吴煦转复美国领事^②。

1861年3月，普鲁士远征队到达上海时，薛焕又再一次进行了劝阻。当艾林波会见薛焕说明来意后，薛焕答称：“臣即办理通商大臣，既因通商请见，自当一体善待，毋须前赴天津。况中国与英、法、美、俄四国立有条约，此外无约各国，仍准照旧通商，尔不必徒劳跋涉。”艾林波则说，他是奉国王之命“径赴天津，若天津不与会商，尚须进京”。为了证明德国并非小弱之邦，艾林波又特意说明：普鲁士与英国“系属姻娅之邦，此次仅带兵船三只前来，专为立约和好，并无他意”。薛焕计穷，便按照奕訢的办法命吴煦求救于英、法、美、俄四国领事，“以此等小国，不能与尔等大国平列，一体立约，嘱其帮同拦阻”^③。清政府的官僚们既存有严重的大国主义思想，又是一些不明时势、不懂外交的

① 《恭亲王奕訢奏折》，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四日，《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2卷，第8—9页。

② 《江苏巡抚薛焕奏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6卷，第23—24页。

③ 《江苏巡抚薛焕奏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6卷，第23—24页。

愚人。他们企图用这种拙劣的激将法，以达到使英、法、美、俄各国领事不致与艾林波“通同一气，或尚可阻止其赴津”的目的，显见出他们的无知与无能。

艾林波去天津之前，他就预先派随员巴兰德到天津会见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巴兰德对崇厚说：普鲁士公使现在上海，两礼拜后即来天津。巴兰德要把艾林波给奕訢的照会交崇厚转递，崇厚不敢接收，连忙飞函请示奕訢，奕訢答复说：该国“素不在换约之列，不得以英、法为比，一律换约。若仅止为通商而来，亦需请旨另派大员办理。其公文，即行接收，拆阅转呈，以凭办理。”^①

奕訢虽然答应请旨另派大员与德国办理通商，但普鲁士使团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终究使他很不愉快。特别当他收到艾林波的照会，知道艾林波要求中国与德意志各邦订立“友好通商条约”，并允许其公使驻京时，更为恼火。他在1861年3月29日的奏折中说：“该布鲁西亚国（即普鲁士），亦不与薛焕豫商，径遣班德（即巴兰德）来津，诚恐各小国纷纷而来，欲求换约驻京，殊属不成事体！”他在北京召见了法国公使馆的哥士耆和英国公使卜鲁斯的秘书威妥玛，说明普鲁士等国来订约驻京，中国“万不能允”。并仍用他的激将法，要求英、法两国“设法阻止”。可是哥士耆和威妥玛，却为德国要求订约进行了辩护。兹节录他们对奕訢的说词如下：

哥士耆：布鲁西亚原系大国。譬如大西洋一国（即葡萄牙），旧在澳门居住，二百余年，极为安静。道光二十二年，虽在江宁换约，但（咸丰）八年间因未在天津换约，该国不肯约束其众，以致漏税滋事，诸弊丛生；若与之换约，则可令

^① 《恭亲王奕訢奏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4卷，第12—13页。

其稽查漏税，严查滋事，颇与中国有裨。如布鲁西亚国，与英、法、美相等者，亦不过一、二国。但驻京则不必允许。倘肯另派大员与之换约，仅通商一事，如或希冀驻京，必当帮同阻止。

威妥玛：布鲁西亚，距英三百余里，系英主之婿，颇称大国，不可不与换约。^①

从哥士耆和威妥玛的这两段说词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之间虽然不是没有矛盾，但在共同对付中国这一点上，却是协调一致，上下其手的。至于哥士耆声称“阻止”普鲁士公使驻京一节，这是因为，他们感到对外国人持友好态度的奕訢的地位还不巩固，他刚刚主持与英、法、美、俄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协助各国公使进驻了北京，如果再迫使他允许普鲁士公使也进驻北京，怕遭清政府中有势力的顽固派大臣们的反对，影响他的地位，从而也损及各国公使的利益，因而他们认为普鲁士公使驻京的时机尚不成熟，故有此表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点也是不真诚的。

毫无世界知识的奕訢等清朝大臣们，本来是很不愿意与德国订立条约的，但经过哥士耆和威妥玛的这番说项之后，态度立时有了转变。在上面所引的同一奏折中奕訢又说：“臣等伏思该布鲁西亚国，既已遣班德来津，若不允其换约通商，必致有费唇舌。哥士耆所称各节，似倘近理。”他还邀请哥士耆到天津去帮助崇厚等与德国使节进行交涉。

不仅奕訢等如此，就连以保守著称的咸丰皇帝，当时正病在热河的行宫中，他也感到，英、法既不能代为“阻止”，也就没有办法了，只得与德国谈判订约。3月29日他颁布了一道谕旨说：

① 《恭亲王奕訢奏折》，咸丰十一年十月十日，《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4卷，第24—26页。

英、法“既不能代为阻止，即当与之换约，以示一视同仁之意。”并特派仓场侍郎崇纶约同哥士耆赴天津，会同崇厚办理^①。

从清政府对德国要求订约态度的变化中我们看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美、俄公使驻京，总理衙门在各国公使的笼络下，清政府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已经丧失了。他事事依靠洋人，听信洋人，从而使各国公使馆达到了控制清政府的目的。当然，这操纵控制是以清朝官吏的无知与无能为内因的。一个愚昧的政府，是难以避免遭受可悲的傀儡命运的！

天津谈判与中德《通商条约》的签订

1861年4月29日，艾林波到达天津，和崇纶、崇厚进行谈判。一开始，艾林波就尽量抬高身价，声称：普鲁士是大国，清廷必须颁发谕旨，加给崇纶“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的头衔，否则不与会商。清政府为了不使艾林波借口进京，只得给崇纶加上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帮办大臣”的官衔。在谈判中，崇纶等起初只想与普鲁士议定通商章程，但艾林波却想比英、法等国签订的条约更增加一码，提出增开台湾之鸡笼、浙江之温州为通商口岸，并允许普鲁士公使进驻北京等^②。艾林波为了达到其目的，他利用中国代表的无知而施以恫吓说：如果不给普鲁士使节驻京的权利，日尔曼地方20余国，将各派一特使前来北京^③。不了解外情的崇纶等，便向哥士耆询问日尔曼各国的情况。哥士耆在介绍了德意志大小28国的情况后指出：“是日尔曼之国虽多，而通商章程，统归布鲁斯（即普鲁士）国办理。”崇纶等根据总理衙门奕訢的指示和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4卷，第27页。

② 《恭亲王奕訢奏折》，咸丰十一年四月十四日，《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7卷，第29—32页。

③ 《恭亲王奕訢奏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7卷，第29—32页。

哥士耆介绍的情况，答复艾林波说：“日尔曼各国通商，均归布鲁斯统辖约束，只办通商事务，不得干预别事。……京师非贸易之区，不能派员常驻。至台湾鸡笼、浙江温州两处，为英、法两国条约所无，断难再行增益。”清政府抱定与普鲁士“所议章程，只能照各国减少，万不能再有增加的”宗旨^①，当然不能满足德国的欲望。此后，艾林波每隔三、五天便送来条约二三款、十数款不等，其中仍有公使驻京一条。清廷的王公大臣们，对于同外国签订不平等的通商条约，损及利权和许与治外法权，是不甚计较的，而对于外国公使驻京，却最为忌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美、俄公使进驻北京，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但那些在皇帝周围的妄自尊大而又顽固保守的大臣们，对此始终深怀疑惧。所以，普鲁士公使要求驻京，他们认为“最关重大，必将此条驳绝，方能将通商事宜，斟酌损益，删除添补”。是以崇纶等屡将不许驻京问题照会艾林波，催其照复。而清政府邀请前往天津帮助办理交涉的哥士耆，“于通商各事无不随处代筹，独此驻京一节，始亦力为阻止，并代拟照会底稿，近则不甚置辩，现已借故回京。”清廷对哥士耆的作为极为不满，特地在“近则不甚置辩”处硃批道：“情伪毕现，勿为所愚”^②。这八个字，可谓是抓住了本质，切中要害。

因公使驻京问题的争执，使谈判陷入僵局。艾林波决心进京对清政府施加压力。他不预先知照清政府，就派巴兰德等3人，带着跟役2名，于1861年6月22日径直入京，在英国使馆的间壁处，强驻了辅国将军奕权之空宅，为艾林波的到达作准备。当第二天奕訢知道这事后，感到“不胜骇异，当即派即补主事成林前往驳斥”。据哥士耆透露，艾林波也准备私自进京；巴兰德等居住

^① 《恭亲王奕訢奏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7卷，第29—32页。

^② 同上。

权宅内，系俄国主使。奕訢接着派候补参领长善，前赴俄国使馆与固理面论，“深斥其非”。固理称：“系该馆内学生柏林派人同往”。文祥也于是日亲赴英国使馆，会见英国公使卜鲁斯，告以“艾林波私自遣人来京，该国既不知礼，中国亦不能以礼相待，非递解回津，恐该国不知敬畏。”文祥说：“艾林波如或来京，各城门已派兵拦阻，倘敢妄自尊大，不服拦阻，欧（殴）打官兵，彼时倘若吃亏，不得谓中国无礼。”卜鲁斯见文祥“词气愤怒”，便转圜说：“现在来京之人，既系布国官员，若递解回津，则该国似乎有失体面，不如照会艾林波，令其迅速调回；倘再不回津，自当凭中国办理。”文祥乘势顺水推舟，表示同意卜鲁斯的意见，以便于此问题的圆满解决。6月24日，由卜鲁斯泐械交巴兰德，先派一人回津，劝告艾林波不要来京。总理衙门派马弁押送同行^①。

经过这次风波，总理衙门的官员们认识到：“此次艾林波私自遣人来京，非独俄国与之朋比，即英国亦难保不与通同一气。”法国的哥士耆虽然透露了一些消息，并建议将“通商悉作罢论”，但清政府也怀疑他是在两边见好，“从中愚弄”了^②。从后来艾林波致函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表示感谢一事来看，法国公使馆一直是支持德国的要求的^③。可见，在中、德谈判缔约的过程中，法国使馆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两面派的角色。

在天津，为德国公使私自派人进京一事，崇纶也当面对艾林波进行了“严诘”。艾林波见事不妙，便假惺惺地在崇纶面前表示“深自引咎”，并声称巴兰德回津后，“必当根究惩办”。但事后艾林波在致崇纶的照会中，仍然为公使驻京问题“哓哓置辩”；在致

① 《恭亲王奕訢等奏折》，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9卷，第4—7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9卷，第4—7页。

③ 《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66页。